

岁月如歌 往事难忘

蒋显礼

我1958年进湖南日报社工作,1986年调离报社,6年后又回到报社重操旧业,这是我与新闻的不解之缘。

我即将离开省委政策研究室时,时任省委书记熊清泉对我一再嘱咐:一是党报很重要,一定要宣传好中央和省委的精神;二是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及时报告,省委、省政府会大力支持。

在我主持报社工作的几年间,省委领

导对办报、新闻大厦建设和高层宿舍建设以及班子建设等,都十分关注,给予了很大支持。

记得有一次我到省委参加会议,会前有位省领导对我说,边远地区同志反映,在省报“上稿难”。为此,我特地到几个边远地区采访征求意见。之后,我们采取加强地州市记者站力量,以及在报纸头版设立“双头条”栏目等办法,较好地解决了边远地区报道少的问题。报道上来了,报纸的覆盖面也大了,影响力和发行

量也上去了。

上世纪90年代前期,正是全国改革开放高潮,新事物层出不穷,问题和困难也不少,干部群众有喜有忧。如何加强舆论引导是件大事。在传达学习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精神时,社编委会议上,我讲了当时社会舆论引导中的一些问题,以及党报在宣传报道中应当注意的事项。随后,我和理论评论部研究,就此撰写了题为《坚持用正确舆论引导人》一文,并寄送中央理论刊物《求是》杂志,不久即予

刊发。

在此之前,我到常德市临澧县采访,发现该县县、乡、村三级办企业成绩卓著,写了通讯《构筑县域经济的新格局》,介绍该县经验。省领导看后,给予肯定,省内一些地县还到该县学习取经。新华社《经济参考报》不久后在头版套红转发。省报文章能登大雅之堂,确实不易,其原因主要在于稿件在当时有较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。

(作者系湖南日报社原社长、总编辑)

周永龄

1981年5月17日晚,长沙大雨倾盆。我家住在一栋老楼房的顶层,风雨钻进屋内,一片狼藉。

深夜11点多,一家五口正打算挤在一张窄床上休息。这时,一阵急促的敲门声突然响起。我打开门,一位高个青年一身湿漉漉地走了进来,说要找周永龄。

他着急地告诉我,他家住城南胜利路307号地下室。这里住着6户人家,因为外面道路比房内地面高出1.5米左右,每逢雨季,地下水就会灌入所有房间。当晚的暴雨,导致屋内积水深达两三寸。他们曾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,一直没有得到解决。

我答应他第二天去查看。18日清晨,暴风雨更加猛烈。我骑着单车,绕过几条街道,爬过一个斜坡,左寻右问,终于找到了胜利路307号。

几乎全身湿透的我走进6户人家一一采访。只见屋内全是两三尺深的积水,有的只好把家具放在床上,有的忙着往外舀水。由于风雨的侵蚀,电线线路发生故障,灯也不亮了。

采访后,我立即打电话,向长沙市电力部门和房产主管部门反映情况。回到报社,赶写了一篇300多字的稿件《低地居民遭水淹 食宿不安》,在《湖南日报》1版发表。当天下午,电力部门即修好了线路。天气放晴后,地下积水的问题也妥善解决了。

一篇“小豆腐块”解决了困扰百姓生活多时的大问题,我想,这就是记者存在的意义吧。

(作者系湖南日报社原社委)

谭毅挺

“杂交水稻之父”是袁隆平院士的尊称。这个尊称之缘起,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。

1983年初,我到安江农校采访袁隆平老师。文章写好后,他不经意地说起了一件往事。

国际水稻所每年开一次国际学术报告会,1982年度的大会在菲律宾召开,袁隆平被安排作学术报告。国际水稻所所长斯瓦米纳森博士庄重地引领他走上主席台,投影仪在屏幕上打出他的头像,下面是英文黑体字“中国的杂交水稻之父”。由于事先没打招呼,袁隆平感到很突然。这时,斯瓦米纳森对与会专家说:“我们把袁隆平先生称为‘杂交水稻之父’,他是当之无愧的,杂交水稻给世界带来了福音。”会议第二天,马尼拉几家主要媒体都以“杂交水稻之父”为题,介绍了袁隆平。

听袁老师这么一说,我先是一愣,他参加那次学术会议的消息是我发的,当时他没讲这件事呀。愣过之后,我觉得有责任让大家知道这件事。

袁老师连连说:“不合适吧?还是莫把这件事捅出来为好。”

袁老师是一位很低调的人,每次采访他,他总爱说:“写欠一点好,千万莫写满了、写过了。”但这回,我坚持要加进这个内容:“赞誉您为‘杂交水稻之父’,不仅是赞誉您个人,更是赞扬中华民族对人类作出的贡献。”

就这样,“杂交水稻之父”的尊称很快在《湖南日报》“亮相”,继而为全国人民所熟知。

(作者系湖南日报科教部原主任)

刘国强

2004年9月,我从全国几十万新闻工作者中脱颖而出,以一名新闻校对的身份,获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第六届“韬奋新闻奖”,实现了湖南“韬奋新闻奖”零的突破。

新闻校对,要有高度的责任感,就像足球场上的守门员,千方百计把点球“扑”出去。我从事校检工作几十年,堵住重大差错数百起,我的一次次“扑球”,就是源于自己的责任感。

有一次,一位记者在一篇关于海南育种的消息中写道“我国最南端的海南岛,早春二月秧田一片葱绿”,事实上中国的最南端不是海南岛而是南沙群岛,我国已多次声明南海诸岛从来就是中国的领土。这个错误提法前几校都没被发现,结果清样时被我发现,及时向当班编委提出,堵塞了一起有关我国领土权的重大差错。另如某企业是港商投资,广告中称为“中外合资”,香港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个地区,这一政治差错,清样时被我发现,又“扑”出了一个点球。还有一次,前几个环节将介绍陶铸同志生平事迹照片,误用成萧克同志照片,也是最后清样时被我发现。

在38年晚班生涯中,我不知牺牲了多少与家人共度天伦之乐的美好时光。30多个除夕之夜,我都在办公室坚守校对岗位。每逢重大活动,我都没有休息过。但我从没后悔过自己的选择。

(作者系湖南日报出版部原部务委员、副编审)

暴雨夜的敲门声

『杂交水稻之父』背后的故事

我是新闻『守门员』

脚板底下出新闻

熊先志

脚板底下出新闻。这句话,是我当记者那些年思考最多、实践最多的一句话。

我坚持六分跑、三分想、一分写,跑遍了全省所有县、市、区,且不是走马观花,而是至少做到每到一地睡一晚、写一稿。脚力,是我紧贴地气的“连接线”,提升自我的“直通车”,写出好稿的“助推器”。

脚力,实质上就是走向基层之力,就是深入群众之力。通过这“连接线”,我听见了群众的心里话,群众利益成了“第一追求”,群众满意成了“第一标准”。即便是群众的“牢骚”,我也会认真对待,因为这其中蕴藏着有价值的信息。1982年4月,长沙市火柴脱销20多天,市民发牢骚,促使我采访16天,走访27家单位112人次,写出《长沙市火柴脱销的原因何在》,获全国好新闻奖。

“脚到新闻到,脚深文不浅”,很多新闻靠脚力才能发现。1992年初,我到株洲南方动力机械公司采访,听公司领导介绍了半天,也未琢磨出稿件的亮点。可在公司门口宣传橱窗上,看到总经理将上级奖给他的3000元奖金用于奖励合理化建议的工人,看到党委书记父亲去世不发讣告、不开追悼会,办丧事用车还自己如数掏腰包……我的眼睛当时就亮了。回来后,我立即以这几个清廉故事为素材,写出了《领导清廉换来职工同心》,见报于头版头条。

(作者系湖南日报原市场专刊部副主任、高级编辑)

苗寨墟场·硫磺澡·记者站

吴兆麟

1978年9月,我调入湖南日报驻湘西记者站当记者,后任站长。从此,我就跟随土家苗胞,攀崖、过沟、涉滩,从湘西的山谷里用新闻作品见证改革开放带给大湘西的变化。为此,采访路上,忍饥受渴、毒蛇惊吓是常事。

1980年春节即将到来时,自治州工商局的一位朋友告诉我,如今凤凰县阿拉墟场热闹起来了。墟场是观察农村经济的一个窗口,我当即就要去采访。朋友拦住我,递给我一份总结材料:“出什么门啰,材料上写得清清楚楚!”我告诉他,湖南日报的记者,自创刊以来,就坚守一个规定:“不到现场不写稿!”

选了一个墟日,我赶到了地处湘黔边境的阿拉墟场。一看,确实不割“资本主义尾巴”了,沉寂多年的墟场热闹起来了。我立即写了《繁荣的苗寨墟场》一稿。返回的路上我满心喜悦,但没想到身上的一个小红点,让挤在9平方米宿舍的一家五口人都传染上了疥疮。在此后半个月里,弄得全家天天忙着烧热水洗硫磺澡!

就在全家人疥疮刚刚治愈不久,当年4月,时任湖南日报社社长杨世芳同志深入湘西调研,站在我家门口(房子太小,进不去人)了解到记者站的困难,立即与州领导联系,请其协助建设好记者站,最终两层楼的湘西记者站,在时任自治州委书记杨正午同志的关心下于1986年建成。

(作者系原湖南农村报总编辑)

以灯为伴 无怨无悔

张渡

报纸工作有一个十分辛苦的岗位,长年以灯为伴,生活“阴阳颠倒”。同时,这又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岗位,处于报纸编辑流程的最后关口,前期任何环节的工作疏忽,都像毫无征兆的“定时炸弹”深埋在这里,稍不留意就有可能被“引爆”,酿成报纸的编校事故。这就是报纸的晚班编辑岗位。

我于1980年秋入职湖南日报社,至2014年退休,前后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22个春秋。我的前

任——时任湖南日报编委的滕纯考同志,生前也长年上晚班。他曾告诫我,上好晚班一要能吃苦,任劳任怨;二要沉得住气,细心再细心。他的告诫,多年来我一直牢记于心、实践于行。

晚班工作,生活规律与家人相反,家庭矛盾时有发生,工作压力也很大,时时如履薄冰。虽然是个辛苦活,但在这里,也常有满满的成就感。

2005年10月12日,我国“神舟六号”载人飞船发射成功,这是我

国第一次实现多名宇航员在太空多天飞行。由于发射时间是上午9时,当天的《湖南日报》无法刊发这一新闻。我向编委会建议当天加出一期《号外》。当天凌晨,在编排完12日的《湖南日报》后,我们又马上着手准备《号外》。9时05分,现场宣布发射成功,11时左右,我们的《号外》就送到了读者的手中,整个版面气势磅礴,社会反响很好。

岁月无痕,但往事并不如烟。虽然我已退休多年,但每每回首这些过往,却足以让我自慰,因为我曾经为我心爱的这张党报奋斗过。

(作者系湖南日报原副总编辑)

温馨的回响

王业武

退休后寄居北京数年,本以为早已告别了激情岁月,一切已经淡然。日前,报社离退办的同志又来京看望我们几个长居北京的退休人员,谈及湖南日报成立70周年,不由心神激荡。我在感受组织温馨的同时,勾起了沉淀的往事。

1993年5月,时任湖南日报社社长、总编辑蒋显礼因公去香港,途经深圳时特意到我下海工作的单位看我。一杯清茶,一席畅言,他问到了工作、家庭,也问到了个人的生活状态,让本以为了断了与报社联系的我,心里暖暖的。

半年后,当我获准迁户,为扎根深圳做准备时,接到蒋社长的

一封亲笔信。他写道:“报社正在改革,报社需要发展,改革发展需要人才。回来吧,报社需要你!”就是这一声呼唤,让我长久深思。

大学毕业分配来报社时,到火车站为我挑行李的人事干部葛良武,患病时带我奔走医院的部主任汪时亮,手把手教我编稿

南海涌大浪 心潮逐浪高

周新太

1988年春节前夕,我被确定为参与湖南日报“南海潮”系列报道4位前方记者之一,并与零陵

(今永州)站的记者李继峰搭档,负责西线报道,包括零陵地区及湘粤毗邻的诸地区,当时仍隶属于广东省的海南是报道重点。

农历正月初四,我将回零陵老家过年的妻儿送上回长沙的火车,便直奔记者站与李继峰会合。我们在零陵的采访十分顺利,各级领导都比较重视。零陵人也闻风而动,利用其毗邻广东的地理优势,主动与广东对接,加快本地区改革开放与经济建设。这些举动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。

紧接着,我们来到海南。每天早出晚归,四处寻找采访对象和素材。当时的海口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万千“淘金者”“弄潮儿”。茫茫人海中,我们遇见了先期登岛的湖南新闻界同行谢先生,得益于他的帮助,我们有了不少收获。

待采访归来,掐指一算,与家人已分别27天整。接下来,便是连续熬夜加班写稿子。

同年四五月份,“南海潮”系列报道在《湖南日报》连续推出,犹如一颗重磅炸弹,引爆了全省新闻界,也引起省里高层的关注,“南海潮”成为当年省委全会的关键词之一。经济学家费孝通对该系列报道给予了高度评价,“南海潮”也被评为全国好新闻。

南海涌大浪,心潮逐浪高。当初自告奋勇投入“南海潮”报道,我就像战士上战场一样兴奋,职业和使命让我义无反顾。(作者系湖南日报原主任记者)

